

2015年 第3辑

战略与管理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危机与出路：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 / 主编

中国劳动份额与经济结构改善进程 李稻葵 徐 翔

亚投行的治理结构、战略前景及相关政策建议 刘建丰

地尽其利：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目标与方向 桂 华

打造人民币国际化的在岸基础：金融强国建设 潘英丽

新产业革命是否发生的判断框架与当前实判 李新锐 等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与发展研究报告 关锐捷 周纳 等

传统社会治理文化的两大基因：关系本位与官本位 单许昌 杨百寅

2015 年 第 3 辑

战略与管理

Strategy and Management

危机与出路：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 / 主编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危机与出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主编.--海口:海南出版社,2015.7

(战略与管理丛书)

ISBN 978-7-5443-6160-6

I. ①危… II. ①中… III. ①中国经济-研究 IV.

① F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65831号

战略与管理 2015 年第 3 辑

危机与出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主 编: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

总 策 划:万 胜

责任编辑:刘 铮

装帧设计:黎花莉

责任印制:杨 程

印刷装订:三河市祥达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读者服务:蔡爱霞

海南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海口市金盘开发区建设三横路2号

邮编:570216

电话:0898-66830929

E-mail: hnbook@263.net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出版日期:2015年7月第1版 2015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0

字 数:238千

书 号:ISBN 978-7-5443-6160-6

定 价:48.00元

【版权所有 请勿翻印、转载,违者必究】

如有缺页、破损、倒装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更换

编者前言

炎夏渐近，气温持续升高，恰似近期资本市场的滚滚热潮。股市的狂飙突进，吸引大妈和90后跑步入场，却引起不少专业人士深忧。中国经济究竟处在什么位置？发展趋势如何？有何迫在眉睫的风险？本辑明显加大了经济类文章的比重，试图通过理性的分析和优质的数据，探索中国经济的真实运行状况及可行的操作方案。

随着经济增速逐渐放缓，下行压力越来越大，各界对当前经济走势的判断，分歧相当大。在国内外，乐观派和悲观派对趋势的解读完全不同。而厦门市规划局局长赵燕菁先生对此则有着独到的看法。他认为，在过剩经济时代，高速增长不意味着违反经济规律，中低速增长也不意味着更多的经济安全。中国既可能像南美、南亚国家那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停滞不前，也有可能像日、韩、新加坡一样，乘势而起，一举跨入发达国家行列。

“中等收入陷阱”，可以被定义为“由于需求不足所导致的经济增长停滞”。这就意味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扩大消费。所有进入发达经济体行列的国家，都是突破了消费瓶颈的国家，消费结构从私人消费为主转变为公共消费为主。公共产品可以

视作市场需求的倍增器，它通过乘数效应成倍地放大潜在的市场需求。公共产品的多寡，乃是区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真正分水岭。可以说，“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公共产品不足的问题。跨过“公共产品门槛”，发展中国家就可以“鲤鱼跃龙门”，一举成为发达国家；跨不过这个门槛，就会消费不足，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状态。

早在经济下行之前，中国就已经出现“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主要症状，比如贫富分化、“免费搭车”现象等。关于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出路，赵燕菁先生指出：解决需求不足的唯一途径，就是升级公共服务。我们只需聚焦两大目标：一是实现社会均富；二是杜绝公益漏失——唯有实现社会均富，公共产品才可能有效定价，潜在需求才可能变为有效需求；唯有减少公益漏失，公共产品才可能通过市场的途径实现充分供给。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经济结构存在严重失衡。外部失衡表现在中国经济过分依赖外部市场，出口占比偏高；内部失衡表现在居民消费占比太低，过去十几年以来一直处于40%以下的水平。清华大学李稻葵教授等人通过分析最新的统计数据，发现中国经济结构已经开始改善，出现再平衡的端倪：外贸顺差占GDP的比重已有所下降，居民消费率已经开始上升。当前经济结构调整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基础性的市场机制，劳动收入份额上升是居民消费率回升的主要原因，也将继续推动经济结构的改善和消费回暖。因此，中国在经济发展战略上应该有新思路，充分考虑宏观经济的新特征。这是对中国经济比较乐观的看法，和前边赵燕菁先生的观点参照起来，可谓相映成趣。

主权货币的国际使用是金融强国内在品质的外在表现。人民币国际化和中国金融强国建设是同一过程，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人民币未

能成为国际货币，原因在于中国长期实行金融抑制政策，成就了 GDP 增长，却导致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中国要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必须从根本上退出金融抑制政策，建立起高效强健的金融体系。潘英丽教授专文梳理了 1953 ~ 2013 年间中国金融抑制政策五个阶段的具体形式、历史作用及其局限性，探讨了金融转型也即退出金融抑制政策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提出了关于银行体系结构改革的构想、股票市场制度改革的思路和加快政府债券市场建设的建议。这些观点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引人深思。

亚投行开局良好，创始成员国对亚投行有很大期待，而未加入国家则在冷眼旁观。亚投行本身取得成功，并帮助中国提升国际金融主导权和领导力还有很远的路要走，挑战也十分严峻。在此背景下，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等单位组织了一次闭门研讨会，旨在通过专家的交流与讨论集思广益，为我国政府的亚投行筹备工作提供一些专业、系统和独立的政策建议。与会专家认为，从创设亚投行的战略态势和战略前景来看，筹建亚投行是中国平行推进新国际金融秩序建设的第一步；在亚投行的规则设计上，中国可以放弃法理上的一票否决权，但是必须具有事实上的否决权；行长人选由中国人出任并非国家战略之必需，或可推荐外国资深银行家出任。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随着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就业，分散、小规模、兼业化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导致土地细碎化，利益驱动造成农业生产要素资源持续流向城镇，引发人们对中国农业发展前景的担忧：地由谁来种，以什么方式种？为此，农业部研究员关锐捷先生等人深入基层进行实地调研，从农业经营体制现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集体所有实现形式、政府购买公益服务、土地适度规模经营五个方面进行了概括和分析，形成了很有价值的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这一课题，期待能引起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热切关注和共同参与。

随着人口外流或涌入，农村宅基地问题日渐突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桂华等人，对全国3省、9县市区的18个行政村的宅基地利用和农村建设管理情况进行了全面调查，以便摸清当前农村宅基地的现状，探索宅基地制度下一步的改革方向。他们的研究报告认为，宅基地管理的基本目标是提高宅基地的使用效率，通过规划推动农村建设，改善农民的生活条件。报告提出下一步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总体方向是，在坚持土地管理不放松的同时，强化建设上的规划管理，充分发挥宅基地的物质功能和社会功能。地尽其利、物尽其用，应是设计宅基地政策的基本原则。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四个全面”相辅相成、逻辑相扣又覆盖面广，需要我们认真领会，逐步找到贯彻落实的方法和途径。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特约研究员张光平先生，对我国十多年来控制腐败、依法治国、政府效能和人均收入的进展进行了国际比较，然后以2013年为起点，提出了推动“四个全面”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从而使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有具体的目标和相应的年度考核指标。这种推导方法也适用于其他领域的改革，颇具启发性。

以上只是本书部分文章的内容提要，未及介绍的其他篇章，亦有不容错过的精彩。《战略与管理》同仁愿与关注国运时局的各界朋友一道，矢志不移地去回应时代的难题，期待与您的再一次纸面相逢。

目 录

国家治理

- 赵燕菁 危机与出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1
(厦门市规划局局长)

- 关锐捷 周 纳 等 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的构建与发展研究报告 38
(关锐捷，农业部研究员；周纳，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副秘书长兼事业发展部主任)

经济战略

- 潘英丽 打造人民币国际化的在岸基础：金融强国建设 73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金融系主任)

- 李稻葵 徐 翔 中国劳动份额与经济结构改善进程 100
(李稻葵，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徐翔，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经济学博士)

- 李新锐 陈亮辉 雷家骕 新产业革命是否发生的判断框架与
当前实判 119

(李新锐,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博士生; 陈亮辉, 清华大学中国企业成长与经济安全中心博士; 雷家骥,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政制之道

- 张光平 贯彻落实“四个全面”的路线图和时间表 139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特约研究员)

- 单许昌 杨百寅 传统社会治理文化的两大基因: 关系本位
与官本位 156
(单许昌,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后;
杨百寅,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

国际关系

- 刘建丰 亚投行的治理结构、战略前景及相关政策建议
——上海交通大学“亚投行”闭门研讨会综述 170
(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现代金融研究中心在职金融学博士生)

- 李尧星 任羽中 李 颢 日本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关系演进
——针对成员国与国际组织互动的经验研究 187
(李尧星,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 任羽中, 北京大学党委政策研究室副研究员; 李颢,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生)

林晓光 钓鱼岛与中日关系 201

(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中心教授, 清华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调查报告

桂 华 地尽其利: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目标与方向
——对 3 省 18 村的调查 227

(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农村宅基地调查组)

管理科学

王志军 战略研究“四不唯” 285

(南京陆军指挥学院军队政工系军事法与国际关系教研室)

危机与出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赵燕菁

引言：新常态与中等收入陷阱

对当前经济走势的判断，大概是改革开放以来最有分歧的。在国际上，既有认为“中国世纪从2015年开始”（Chinese century）的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2015），也有预言“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的沈大卫（David Shambaugh, 2015）。

在中国，乐观派和悲观派对趋势的解读也完全不同。林毅夫（2015）是乐观派，他认为“中国经济未来还有10年或更长时间增长8%的潜力”。理由是“人均GDP是衡量中国和发达经济体差距的标准，中国2014年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3%~14%，按照购买力也只有美国的25%左右。日本、韩国在以往发展阶段中，在追赶差距的过程中取得了8%~9%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利用后发优势也具有实现8%以上增速的潜力”。

针对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中国经济的放缓，林毅夫认为主要是由外部因素及周期性因素引起的，理由是其他国家也全面放缓，甚至比

中国下滑得更严重^[1]。面对外部冲击，中国政府应当且可以采取反周期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措施以维持7.5%的增长率，同时保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毕竟中国拥有很高的私人 and 公共储蓄，外汇储备超过3.3万亿美元，并有实现产业升级和改善基础设施的巨大潜力。

比较中庸的观点是，过去几年中国经济超高速增长并不符合经济规律，今后中国经济增长将会长期保持在目前7%左右的“新常态”。按照厉以宁（2014）的说法“‘新常态’就是按经济规律办事”。换句话说，以前高速度是不正常的，“以百米的速度跑马拉松”只能是暂时的现象。现在速度降下来，不过是“符合经济规律”而已。

而悲观派则认为，中国经济会继续下滑，并有极大的危险陷入世界银行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Indermit Gill & Homi J. Kharas, 2007）中提出的“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许多经济体常常都能非常迅速地达到中等收入阶段，但只有少数国家能够跨越这一阶段。”

许小年就是悲观派的代表：“目前经济数据的走弱、增长速度的下行，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周期现象。”原因就是收入分配的失衡导致的“产能过剩、投资需求不足”（许小年，2014）。在悲观派看来，此次经济下滑的原因来自内部，是结构性的。像2008年那样通过巨额固投拉动经济的做法已经无法奏效，因为需求不足，更多的投入只会增加库存，使经济更加恶化。他认为“这是一种结构性的衰退，跟大多数经济学家理解的周期性衰退不一样。”

混乱的解释，源自混乱的理论。中国经济从短缺进入过剩后，原

[1] 例如，巴西的GDP增长从2010年的7.5%下降到2011年的2.7%、2012年的0.9%；印度从10.5%下降到3.2%；韩国从2010年的6.3%降至2011年的3.7%、2012年的2%；台湾从2010年的10.7%下降到2011年的4.1%和2012年的1.3%，新加坡从2010年的14.8%直坠到2011年的5.0%和2012年的1.3%。

来短缺经济行之有效的政策，在过剩经济时代已经不适用了。但有效的政策是什么？这需要对经济过剩的原因有更深刻的理解。高速增长不意味着违反经济规律，中低速增长也不意味着更多的经济安全^[1]。中国既可能像南美、南亚国家那样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长期停滞不前，也有可能向日、韩、新加坡一样，乘势而起，一举跨入发达国家行列。简单的类比，可能因参照物不同而得出完全相反的结论，重要的是明白两种对比物各自形成的原因。

一、中等收入陷阱：从短缺到过剩

那么什么是“中等收入陷阱”？提出这一概念的世行报告并没有给出一个官方的定义。维基百科倒是有一条解释，但也只是描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特征：“中等收入陷阱是指一个国家（由于某种优势）达到了一定收入水平，将停留在这个水平的情况。由于工资上涨，制造商常常发现自己无法和别国的低成本生产商相竞争，但他们仍觉得自己处于高附加值产品的先进经济体内，这就是中等收入陷阱。”百度百科的解释也差不多：“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当一个国家的人均收入达到中等水平后，由于不能顺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最终出现经济停滞的一种状态。”

美国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和他的合作者在2011年3月发表了一篇标题为《快速增长的经济体什么时候增速放缓：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含义》（Barry Eichengreen、Donghyun Park、Kwanho Shin, 2011）的论文。在他们看来快速增长的经济体是一定会出现增速下滑的。原

[1] 就像每天走100公里，对于马车是很快的速度，但对于汽车却是很慢的速度。不同的制度设计，决定了一个经济体是马车还是汽车。离开制度简单地比较数字，得不出任何有益的结论。

因有四：农村剩余劳动力耗尽；经济增长更加依赖于难于提升生产率的服务行业；巨大资本存量带来更多的折旧需要弥补；经济接近技术前沿，仿效让位于更加困难和高成本的创新。

所有这些论述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都是从生产和供给的角度来定义和解释“中等收入陷阱”的。症状表现在生产，处方自然也是针对生产^[1]。事实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本身就遭到不少经济学家的质疑（姚枝仲，2014）。任何收入阶段，都有自己的增长陷阱。增长放慢只是外在表征，发展中国家难以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真正原因，并不能通过数据本身得到解释。“中等收入陷阱”这个概念要想站住脚，首先就要说清与其他收入阶段低速增长的原因有什么不同。

马尔萨斯（1789年）的“低收入陷阱”（Poverty Trap）和“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差别，在于生产关系中，生产与消费、供给与需求的逆转。如果把“低收入陷阱”定义为“由于供给不足导致的经济增长停滞”，那么由于整个社会处于供大于求状态所导致的“中等收入陷阱”，可以被定义为：“由于需求不足所导致的经济增长停滞。”“低收入陷阱”缘于供给不足，首先是生产问题；“中等收入陷阱”源于消费不足，首先是消费问题。这就意味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回答的问题，不是如何改进生产，而是如何扩大消费。所有进入发达经济

[1] 例如：林毅夫给“中等收入陷阱”开出的处方是，按照要素禀赋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一是深化改革完成向市场体制的转型；二是政府应在产业、技术结构升级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楼继伟（2010）也指出，当一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传统部门竞争力因劳动力成本上升而被削弱，前沿技术因无法引进而需要依靠创新，这些都要求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战略有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如果转型不及时或不成功，就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刘伟认为：能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重中之重就是创新。“在这个过程当中，民营经济的发展极为重要”。没有彻底搞懂中等收入陷阱的形成机制，自然也就无法提出正确对策。这类适于所有病人的标准处方虽谈不上有什么错误，但肯定算不上对症下药。

体行列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突破了消费瓶颈的国家^[1]。其发达程度，取决于生产过剩问题解决的程度。

怎样才能解决消费不足？在传统经济学看来，消费不足只是关于收入数量的问题，是线性的变化。扩大消费的途径，就是增加个人和家庭的收入。如果收入还消化不了过剩的生产力，就必须依赖出口；如果出口面对竞争，就会发动战争。这就是两次世界大战之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增长逻辑。

但战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升级为发达国家，却并未遵循这一传统逻辑。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内需模式出现了重要变化——集体消费取代个人消费，成为消费市场的主体。公共产品需求带动了国内消费市场的急剧扩大，扩大的国内市场再通过全球化连接为一体，极大地缓解了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矛盾。这些国家的实践表明，经济从短缺变为过剩，并非缘于个人收入不足，而是消费结构的不同——从私人消费为主转变为公共消费为主。这种消费结构升级，不是简单的数量增长，而是结构性的非线性转换。

我们只要比较下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个人消费的差异，就可以发现，从住房、汽车到彩电、冰箱，几乎所有个人消费品方面，两者并没有太大差距。两者之间的真正差异，主要体现在社保、医保、环境、治安、教育、公路、铁路、通信、电力、给排水乃至国家安全这些公共产品的消费上。一个发达国家的家庭，收入的30%~40%用来购买公共服务并非罕见^[2]。而发展中国家家庭，购买公共服务的数

[1] 在生产不足阶段，贫富差距并不是问题。相反，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提高供给最有效率的做法。而一旦市场从供不应求转向供大于求，贫富差距就立刻成为制约经济升级的主要瓶颈。

[2] 以加拿大为例，2009年家庭平均收入69,175加元，总纳税支出为28,878加元，占收入的41.7%。多数欧洲国家的这一比重还会更高。日本也差不多，比如，年收入33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23万元）以下者交10%；年收入330万至900万日元者交20%；年收入在900万至1800万日元者交30%；年收入在1800万日元以上者交37%。

量和占比都要低得多^[1]。

这种消费结构的转变，不仅反映在家庭支出结构上，也反映在战后发达国家集体消费产品的支出占国民经济比重持续且不可逆的增加上。斯蒂格利茨在1998年就注意到：“现在美国政府的支出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强，而在一次大战前的1913年则不到百分之十，……法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公共部门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二分之一强。”^[2] 富裕的北欧国家则更高。

不仅消费出现结构上的变化，大量生产活动也越来越显示出对规模巨大的集体消费模式的依赖。任何产品的生产，都由固定成本（fixed cost，如资本）和可变成本（variable cost，如工资）两部分构成。两类成本构成不同，决定不同生产方式资本的有机构成。公共产品（比如公路）可以帮助私人产品（比如汽车）实现大规模生产，从而极大地降低单位固定成本（平均成本），抵消可变成本（工资）的增加。

马化腾说：“互联网相当于电力时代的电。”其中的“电”就是产业的“公共产品”，各类电器则是私人产品。可以说，发达国家所有主导产业，都可以视作“公共产品+”（Public goods plus）组合而成的产业。“互联网”是公共产品，各类应用则是私人产品；“道路”是公共产品，各种汽车则是私人产品……产业的升级，首先就是公共产品的升级。

产业升级无法自我实现——它是公共服务升级的结果。大规模生产使有机构成高（资本密集）产业的发达经济（市场较大且工资较高），形成相对于不发达经济（市场较小但工资较低）的比较优势。结

[1] 考虑到灰色收入时更是如此

[2] 郑秉文对此解释说：“当个人收入超过一定水平时，公共产品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就需要越来越多的政府服务。这时，医疗保健、文体设施、交通运输、社会保险、公共安全等优效型公共产品就开始日益‘侵占’和‘挤占’消费结构中的私人产品的相对份额。”

果就是发达国家经济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工资占比大），升级到资本密集的“公共产品+”产业（资本占比大），而将不具有比较优势、有机构成低的私人产品生产转移到工资较低的国家^[1]。

凡资本密集型企业，必依赖市场规模才能获得足够的竞争力；若要获得必要的市场规模，就必须依托发达的公共基础设施。阿斯乔（Aschauer, D. A. 1989）对1950~1988年的公共投资曲线的分析表明，头20年，公共投资上升阶段，要素生产率是2.8%、私人资本收益率10.7%、私人投资率3.8%；随后的下降阶段，则分别降至1.4%、7.9%、3.1%。他的分析显示，公共投资每增加1美元，私人投资就增加0.45美元。阿斯乔的研究，证明了本文的观点：（1）公共产品是私人产品升级的基础；（2）公共基础设施与私人投资是相互补充的；（3）落后的基础设施将会严重阻碍整个经济的运行。

对比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可以发现，两者之间的本质差别，在于前者有着远比后者发达的公共产品（或者说集体消费）市场。正是因为市场结构（而非市场规模）不同，发达国家的人均消费能力可以高出发展中国家几个数量级。

公共产品的多寡，乃是区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真正分水岭。“中等收入陷阱”问题，很大程度上，就是集体消费不足的问题。与其说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存在一个“中等收入陷阱”，倒不如说，存在一个“公共产品门槛”——跨过这个门槛，发展中国家就可以“鲤鱼跃龙门”，一举成为发达国家；跨不过这个门槛，就会消费不足，长期徘徊在中等收入状态。

[1] 同理可知，发达国家能否跳出“高收入陷阱”，取决于能否在提高有机构成上超越竞争对手。尽可能使用技术和资本，前提就是更大的市场规模。美国作为发达国家的影响力，关键在于其控制的巨大市场。中国如果要超越美国，关键的指标就在于消费市场能否超越美国——第一步是国内市场，第二步是全球市场。